

## 刑事二审改判“无界化”的公正性省思

○ 何德辉

(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 公诉一处, 浙江 金华 32101)

〔摘要〕《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刑事上诉案件实行全面审查原则,然而无论是典型个案,还是统计数据,都表明该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执行异化,即刑事二审出现“无界化”,由于检察机关对此监督不力,从而造成司法腐败、效率低下、初审判决权威受损等多种危害。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回归全面审查原则的价值诉求,强化两级法院的双向制约,统一上诉改判底线,强化检察监督。

〔关键词〕刑事上诉;改判;全面审查审;双向制约;改判底线;检察监督

司法实践中刑事二审改判随意性较大,改判几乎没有任何“边界”,无视初审判决的权威与既判力,滥用审判监督权的问题突出。其错误的理论根源在于对《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误读,认为“全面审查原则”就是“推翻初审的一切重来”,把“全面审查”当作“随意改判”的同义词,造成刑事二审改判的“无理由化”、“无边界化”。然而,司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与研究。笔者从基层司法实践者的视角,以二审改判典型案例为实证依据,对刑事二审改判的边界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引起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该问题的重视,并通过理念转变和制度改造,彰显司法公正。

### 一、公正性:二审改判不可跨越的边界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是司法的本质要求。<sup>〔1〕</sup>司法公正的实现既有赖于完备的实体法律规范和正当的司法程序,也离不开科学的司法体制机制及高

---

作者简介:何德辉(1979—),法律硕士,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研究方向为刑事司法实务。

素质的司法队伍。在法律制度日趋成熟和公众法律意识渐次增强的司法环境下,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仰赖和认同主要体现在公正、高效的司法裁判特别是一审裁判上。然而,我国司法人力资源的“倒金字塔”的配置模式不仅使得承办全国80%以上一审案件的基层法院司法资源不足,并衍生出“案多人少”的司法供求矛盾,而且司法人员的素质结构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层级差异,即级别越高的法院,其法官的专业素质结构和审判能力越强,反之,则相对较弱。另外,现行司法体制的地方化、行政化等因素也给基层法院独立、公正地司法带来不利影响。对基层法院而言,上述不利因素的叠加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司法的公正度,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甚至冤假错案也就在所难免。对此,通过二审对一审裁判予以公正性矫正尤显必要。可以说,二审改判既是实现审判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环节。

当然,在对待上诉或抗诉的态度上,二审法院既不可“官官相护”,也不宜先入为主地质疑一审裁判的公正性。从维护个案公正和一般公正辩证统一的角度考量,二审法院既要维护上诉或抗诉案件中当事人公正诉求,也要适度尊重一审法院所承载和表达的司法权威、司法效率等价值诉求,合理抑制当事人上诉权的滥用和误用。换言之,我们切不可陷入上诉必有理、二审必改判的思维怪圈。不论是对一审裁判的合法性问题,还是针对其合理性问题,也不论是针对裁判的事实问题,还是针对其法律适用问题,都不应当超越公正的界域。

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只要一审认定正确,显然不是二审改判的理由,否则,就是对司法公正赤裸的亵渎;对于案件的定性和对诉讼程序的遵守,二审法院同样应受到刚性的羁束,只要一审认定无误,这也不是二审改判可触及的界域,否则,便是对司法公正的悖逆。而对于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具有自由裁量权的定量问题,则需要二审法院审慎为之。我们认为,只要一审裁判的定量并无明显的偏执,二审法院就不宜以裁量畸轻畸重为由予以变更。诚然,在此情形下,二审改判(哪怕是象征性的改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上诉者带来一丝慰藉或颜面,并使二审法院和法官表现出公正形象和权威。但不可否认,二审法院的改判不自觉地损害了一审法院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并降低司法效率。二审改判确因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的错误,这并无任何不妥,而如果仅因一审、二审法院在自由裁量权适用上的分歧,二审法院执意顾忌当事人的诉求和自身技高一筹的颜面,并予以改变一审裁判,这无疑是司法公信力的自我贬损。再者,一审法院、法官与二审法院、法官所处司法环境的不同,其在自由裁量权运用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舍差异既是客观的,也是正常和正当的。尊重这种事实,就应当准许两级法院在事实判断、案件定性之外的问题上存在差异性处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某些情况下,结果的公正可能很难确定的,因为人们对法律上的认知差异、其主观愿望与司法裁判结果之间的反差程度,都会导致人们对裁判结果持否定态度。<sup>[2]</sup>总之,二审法院在改判时应当秉持公正的理念和底线,既要注重对一审法院羁束性问题判断正确与否的严格审查,也应当

对一审法院自由裁量权适用的理性认同,不可跨越公正的底线。

二、刑事二审改判的“无界化”的考证

案例:金某某等人因眼红邻居挣了大钱,遂绑架了该邻居的女儿向家属索要钱财,期间假意帮助找人劝阻,实为延误报警。后被警方查获移送审查起诉,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不服,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等情形下,二审法院强行认定一审判决量刑不当,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初审法院判决在法定刑范围内,没有新证据、新事实,法律无变化,二审法院判决也在法定刑范围内。两级法院所做判决均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但仔细推敲,二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与初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发生冲突,有何理由认为二审法官就代表更加公正合理,特别是在两级法院均非量刑畸轻畸重时。这就引出了刑事二审改判的“无界化”问题。

所谓无界化就是随意化,任意改判。本文开头所引用的案件并非孤例,类似改判的案件十分普遍。笔者对某地级市近三年的 446 件 928 人上诉案件中,随机抽样了 225 件 473 人上诉案件进行调查分析<sup>[3]</sup>(根据统计学的原理,选取统计对象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个体进行统计分析,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能反映统计对象的基本状况)。统计分析显示直接改判案件 38 件 100 人,占抽样案件总数的 16%。为了剖析上诉案件改判原因,我们对 38 件案件进行了逐案分析,发现以下特点:

1. 因事实原因改判的比例较高。在 38 件上诉改判案件中,因事实原因改判的 28 件 69 人,占改判案件的 76.92%;因适用法律错误改判的 2 件 2 人,占改判案件的 3.85%;因量刑不当改判的 6 件 26 人,占改判案件的 15.38%;因民事部分改判的 2 件 3 人,占改判案件的 7.68%。可见,因事实不清或事实变化等事实原因改判的案件占上诉改判案件绝大部分。(具体见表一)

表一 上诉改判案件情况

项目	案件数 (件/人)	占改判数 %
事实原因改判	28/69	73.68 %
法律错误改判	2/2	5.26 %
量刑不当改判	6/26	15.79 %
民事部分改判	2/3	5.26 %

2. 出现立功等新事实的改判率较高。在事实原因改判的 28 件案件中,因一审认定犯罪事实本身不清的 6 件,占改判案件的 21.43%;二审期间出现立功情节的 15 件,占改判案件的 53.57%;二审重新认定自首、二审主动退赃的各 1

件,占改判案件的 3.57%,鉴定结论变化的 2 件,占改判案件的 7.14%;达成民事赔偿和解的 3 件,占改判案件的 10.71%。统计反映,二审期间新出现的立功情节成为直接改判的主要理由,其中,职务犯罪案件二审程序中出现新立功较为普遍,有 12 件,占了所有出现新立功 15 件案件的 80%,这应引起关注。(具体见表二)

表二 事实原因改判 20 件上诉案件情况

项目	案件数 ( 件 )	占改判数 %
犯罪事实不清	6	21.43 %
出现立功情节	15	53.57 %
认定自首情节	1	3.57 %
鉴定结论改变	2	7.14 %
二审主动退赃	1	3.57 %
民事赔偿和解	3	10.71 %

更有案件初审判决对某一量刑情节进行了充分考虑,并予以减刑,二审法院再次以这种量刑情节为由,对该案件进行改判。例如叶某等 5 人合同诈骗案,对于其自首情节,初审判决已经在判决书中加以充分考虑,但是二审法院以自首为由再减。显然二审改判的“无界化”确实存在,具体表现有:

1. 以初审量刑不当为由改判率畸高,且初审判决又非量刑畸轻畸重。在所有改判案件中,以量刑不当为由进行改判案件占总数的 25.40%。也就意味着二审改判的案件中有超过 1/4 的案件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以量刑不当进行改判的,且这类案件改判的幅度一般为一到两个月,如此小的量刑改变幅度无法体现初审判决时真正属于“量刑不当”。

2. 对“民事赔偿”两级判决重复减刑。刑事和解是通过对被害人的赔偿,能有效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减轻犯罪的危害性。初审期间为此减轻被告人的处罚,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若初审期间未能达成和解,而二审期间和解改判并无不当。但是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初审达成刑事和解并支付部分赔偿金,初审量刑已经对刑事和解因素进行了考虑,若二审上诉人再次支付另外部分赔偿金或者增加赔偿金,二审再次减刑,而如果被告人把所有的赔偿一次性支付,反而得不到减刑,这完全违背刑事逻辑和公平正义原则。如柳某某等三人共同故意毁坏财物案件,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初审判决已经考虑到被害人的损失已经得到赔偿,在法定刑范围内最低格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审再次在此基础上,以被害人得到赔偿为由改判缓刑。

3. 履行初审判决的情况被作为改判因素。缴纳罚金等履行初审判决的情况,是被告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被二审作为量刑改判因素,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如果允许履行初审判决的情况作为二审改判结果,那么几乎所有的涉及罚

金、没收财产及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都可以因此改判,这等于打开了二审案件改判的潘多拉盒子。如庄某某赌博案,庄某某因犯赌博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二审期间缴纳了初审判决的罚金,二审据此减轻刑罚两个月。也有部分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在初审期间部分退赃,认定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退赃,减轻处罚。二审期间再次退出部分赃物,二审再次以此为由进行减刑,也有类似隐患。

### 三、刑事二审改判“无界化”的公正性隐忧

#### (一) 为司法腐败提供温床

司法腐败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司法队伍整顿的重点,虽然人数不多,每年违法违纪受到惩处的人员平均 864.6 人,只占整个法院队伍的 2.85%,但是影响极其恶劣。<sup>[4]</sup>司法腐败不仅可能滋生于一审程序中,也可能发生于具有审判监督职能的二审程序中,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司法权力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或者权力存在恣意的空间。由于二审法院的权力无限扩大化,加上最了解案件量刑情况的初审法院几乎不可能对二审判决进行监督与制约,二审极为容易成为钱权交易的场所,关系案、人情案也难以避免。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并非危言耸听。如果允许对初审判决在法定刑范围内,在未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以量刑不当为由,任意进行改判,这里面即使没有司法腐败行为,也难免令人生疑,损害司法机关公信力。

#### (二) 影响初审的司法权威,造成初审判决的不可预期性

马克斯·韦伯对权威的理论分类,司法权威是一种法理型权威。<sup>[5]</sup>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威类型,司法权威是指司法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令人信从的地位和力量。一方面,司法权威是一种特殊的公权力,是具有权威性的公权力;另一方面,司法本身还应当具有社会公信力。如果当事人不服裁判的比例过高,必然影响社会一般公众对司法裁决的认可程度,影响司法权威的建立。<sup>[6]</sup>由于二审改判的随意性,造成初审判决的不可预期性,最后演变成初审判决的无用论,初审判决的功能与预期作用被全部剥夺,必然影响初审法院的司法权威。试想一个可以被随意变更的判决,必然不可能得到尊重。美国肯尼迪大法官说:法官的经历教给我一件事,你不是法庭中唯一一个客观、公正、中立、博学、没有偏见的人。<sup>[7]</sup>同样对于二审法官来讲,也应该认识到自己并非唯一“客观、公正、中立、博学、没有偏见的人”,二审法院应当明白,初审法官的判决,也是基于其司法实践经验与对司法正义的追求,两级法院法官能力与素质并无明显差别,对于初审法院应有适当的尊重。

#### (三) 造成诉讼效率降低,案件矛盾上移

公正法律中的第二种涵义是指效率。<sup>[8]</sup>基于上诉改判的随意性,被告人对于初审判决的确定性权威基本不抱希望,那么对于初审的重要性必然重视不够,甚至可能在初审期间隐匿有利证据,在二审开庭时再次出示,违背诉讼规



律,导致诉讼成本的成倍增加、诉讼效率低下。如果刑事诉讼活动不讲效率或者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则当事人就会饱受诉累,从而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失去信心,司法就不可能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其公信力也就无从谈起。<sup>[9]</sup>由于案件的争议最终在二审期间解决,将本来在初审期间能够解决的社会矛盾转移到二审期间,造成矛盾上移,这便无法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另外,基于二审改判的任意性,必然造成部分犯罪嫌疑人利用这一点,利用各种手段达到二审减刑效果。如本可以在初审期间支付完毕的赔偿金,本可以在初审期间完全退赔的赃物、赃款,留到二审再支付一些,造成诉讼拖延,多生变数。

#### (四)打击初审法官积极性,不利于初审判决质量的提高

首先,二审的频繁改判,置初审法官的智慧与劳动于不顾,造成初审法官动辄得咎的心理,必然对其自信心与自尊心造成打击,不利于培养其职业尊崇感,易进一步造成基层法官流失。其次,由于初审判决的极端不确定性,初审法院法官患得患失心理较重,必然更加依赖二审法院的意见,造成内部请示的进一步普遍化、口头化,加大初审法院法官对二审法官的依附性,也不利于初审法官提高自身素质,不利于初审判决质量的提高,这样反过来加大二审改判力度,形成恶性循环,基层群众更加难以感受到司法的进步与公平。

### 四、刑事二审改判“无界化”的归咎

#### (一)“全面审查原则”的误读

按照刑诉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就初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一并处理,这就是理论上的全面审查原则。全面审查原则是建立在司法能动主义、真实发现主义的基础上,有其历史的合理性。<sup>[10]</sup>然而,司法实践中不少司法人员将“全面审查原则”误读为“任意改判原则”,这也是是刑事二审改判“无界化”的根源所在。基于我国的司法实际,全面审查原则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全面审查原则不等于无视初审判决的“任意改判原则”,更不是二审法院的包办代替。实践中由于二审审查范围的无限和二审改判理由的无限可能性,一定程度上已造成二审与初审职能定位的不明。而几乎无视初审的任何依据和理由,对于二审的认定依据不进行任何解释就自行进行改判量刑的做法更是不当的,也是严重损害初审判决权威的,不符合诉讼规律的。

当前,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认识到了该现象,但错误的认为二审裁判权滥用的原因不在于全面审查原则。理论界对于全面审查原则进行批判的主要原因是看到了二审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二审法官的任意性和二审改判的无规则性,因此要对全面审查原则进行变更或者限制。其认为全面审查原则导致“控审不分,使得二审程序的结构被扭曲,严重背离了司法权运作程序正当化中被动性和中立性的基本要求”,同时“这种机械性质的进行貌似公允的全面审

查,不仅有悖司法权运作的基本规律和诉讼程序的安定性,最终也必将造成诉讼拖延和诉讼效率的下降”。<sup>[11]</sup>提出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变全面审查原则为有限审查原则,二审法官的权限必须来自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或者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这种观点错误的认为是全面审查原则给予二审法院不受制约的独断,破坏这种审查机构内部的相互均势。其改革目的在于使二审法院与初审法院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格局。但是并没有找到二审滥权的根源,即是“全面审查原则”看成了“任意改判原则”。对于这点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试图拿全面审查原则开刀,对于解决二审法官的滥权问题反而增加了许多阻力。

## (二) 二审法官思维“初审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两审终审制,两审法院必然都有其独特的功能,那么两级法院的判决应该相互制约,不仅仅是二审法院单方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与指导,二审法院改变初审法院的判决也必须有明确的依据和理由,不得任意并更,否则初审判决便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但是因我国长期的威权体制和法官等级化管理模式的影响,二审法官在权力位阶的安排中,相对于初审法官来讲,是更高级别的审判者,潜意识里容易把初审法院的判决作为下级法官的判决。<sup>[12]</sup>在司法实践中二审法官把初审法官叫到其办公室训斥,责问其判决的证据采纳与取证情况的现象并不罕见,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无论是初审法官和二审法官均没有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初审法官对于二审法官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对二审法官个人产生看法,但是并没有意识到二审法官有无此权力。在案件的实际办理过程中,有的二审法官把初审判决作为二审的判决的“草稿”,无视初审判决的法官的判决智慧与能力,可以任意“涂画与修改”,把自己视同初审法官,二审改判起来自然无需任何理由。

## (三) 两审法院关系的异化

我国宪法关于两级法院关系的规定是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没有赋予两级法院之间的领导关系。但是有的地方两级法院的关系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是初审法院对个案定性量刑的内部请示普遍化、制度化、“非书面化”,导致二审法院权力无限扩大化,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二是二审改判随意性较大,二审改判没有任何“边界”,基本可以无视初审判决的权威与既判力,这反过来又逼迫基层院加强对二审法院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大个案判决前的内部请示的力度,强化了两者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也表现为初审法院对二审改判没有任何制约措施,也不敢表示任何不满。

## (四) 检察机关不敢、不愿、不能监督

针对二审量刑畸轻畸重的判决,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不存在理论和制度障碍,检察机关对此进行监督也有足够的动力。但关键的问题是二审在法定刑范围内随意对二审案件进行改判的情况,检察机关存在着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能监督的情况。因为二审随意改判但判决仍在法定量刑幅度内,检察机关担心如果

进行监督,理论界会认为侵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这种观点无论在司法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有极大的市场,检察机关面临着尴尬局面,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因此不敢、不愿监督。所谓不能监督,则是检察机关也缺乏可行性的法律监督手段。目前检察机关比较常用的监督手段无外乎提出抗诉、发出检察建议或者纠正违法。虽然二审改判的理由不充分,但仍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不符合抗诉条件,再审的理由也不充分。这类型的案件即使提出抗诉,改判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而检察建议又无法针对大批量个案一一进行,只能被动等待大批类似的案件出现才能发出检察建议,且检察建议缺乏强制性的效力,其效果可想而知。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刑事上诉审检察官监督履职的范围和程序性保障不完整,一方面缺乏对一审未抗诉案件以及二审法院书面审理案件的监督,另一方面在抗诉的设置上,虽然给予了抗诉以优势地位,但监督的权力与义务缺乏对称性。<sup>[13]</sup>这些制度和实践层面的障碍均制约了检察机关对二审法院合法但未必合理的改判。

## 五、刑事二审改判机制的公正性回归

### (一)明确否定全面审查原则与任意改判原则等同的理念

全面审查并非任意改判,即全面审查原则并没有赋予二审法官裁判案件不受初审判决或者上诉人请求之内容制约任意改判的自由。全面审查原则的建立是基于我国司法理念中的有错必纠原则,全面审查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之下有其必要性,二审期间对于初审法院审理的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也符合当今民众的期许和社会现实。若是由立法解释或是司法解释对全面审查与任意改判关系进行明确,无疑是解决二审法官专断的有效途径,也是最经济、成本最低的对诉讼制度进行改造的可行方式,必将对整个刑事诉讼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两级法院关系异化必将得到很大改善。如果刑事初审判决能够达到预期的稳定效果,必然相应地减弱向更高审级寻求再次审判的动力,二审法院更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法律的统一适用上。

### (二)强化两级法院的双向制约,明确初审法院对二审法院的制约关系

“审级制度在保障司法正确性方面的原理在于,通过上下级法院之间权力分层或‘分权’的技术设置,使上级法院在制约下级法院的同时,自身的权力也处于制约之下,形成双向制约”。<sup>[14]</sup>在两级法院的审级制度中,应切实改变法院和法官的等级制和行政化。防止两级法院关系,由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在运行中演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就必须改变单向监督关系,对双方的监督机制进行改造,如取消法官的行政序列配置,取消法院的内部请示制度等。

### (三)统一二审改判基本底线:不侵犯初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以色列希伯莱大学法学院教授巴拉克指出:“自由裁量权是在两个或更多的可选择项之间作出选择的权力,其中每一个可选择项皆是合法的。一审法官在合法的可选择项内进行了选择,除非有重大过错或不当之处,一般不得更



改。”<sup>〔15〕</sup>所以,对刑事二审改判也当引进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和精神。对于初审判决存在的显而易见错误或者根本性、重大性错误,二审应当予以纠正,否则就违背司法机关的基本职责要求和公平正义法则。对于初审判决存在的瑕疵性错误,则应保持一定的谦抑。其次,借鉴当前法院系统量刑规范化的做法,制定切实可行的二审改判操作规程,统一二审改判基本底线,明确二审改判的基本范围。如明确对背离量刑规范化多少幅度的初审判决可予以改判,从制度上制约和限制二审裁判权的滥用,是解决二审改判“无界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 (四)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对二审改判“无界化”的制约

首先,检察机关要拓宽思路,建立大监督思维。检察机关自身二审监督手段薄弱的情况下,可积极求助于人大等力量进行联合监督。人大是宪法规定的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对于法院无理由改判案件较多的现象,可以向人大进行报告。其次,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除抗诉外的其他监督手段,综合运用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等两种方式予以纠正。对于法院无新事实、新理由改判的案件,改判理由过于牵强的,要及时发出检察建议,必要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第三,要加大对二审改判案件背后的司法腐败的打击力度,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坚决予以打击。

#### 注释:

〔1〕〔2〕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5、17页。

〔3〕本文的相关数据来源于笔者所承担的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2013年度单位课题,课题名称《金华市刑事上诉审改判情况调查分析》,该课题完成后以文件形式下发并正式上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对随机抽样的案例笔者进行了逐案翻阅并仔细研判了其中的38件改判案件,并在此基础上统计分析,挖掘典型案例。

〔4〕朱景文:《中国法律职业:成就、问题和反思》,《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41页。

〔6〕陈光中、肖沛权:《关于司法权威问题之探讨》,《政法论坛》2011年第1期。

〔7〕何帆译:《谁来守护公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8〕〔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9〕谭世贵:《诉讼效率视角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进一步完善》,《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10〕秦宗文:《刑事二审全面审查原则新探》,《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

〔11〕蔡澈:《刑事二审审理方式改革路径及方案研究》,载《中国刑事二审程序改革之研究》,北大出版社,2011年。

〔12〕陈卫东:《刑事二审开庭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13〕石柏非:《检察官在刑事上诉审中的职能作用》,《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5期。

〔14〕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15〕朱建华:《量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河北法学》2009年36期。

〔责任编辑:徐子〕